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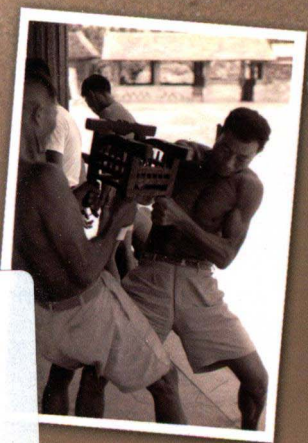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Folk Religion in a Taiwanese Village

神・鬼・祖先

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

焦大衛 (David K. Jordan)

丁仁傑 譯



臺灣研究叢刊

神・鬼・祖先

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Folk Religion in a Taiwanese Village

焦大衛(David Jordan)著

丁仁傑 譯

臺灣研究叢刊

神・鬼・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

2012年10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焦大衛
譯者 丁仁傑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229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21號1樓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編輯 沙淑芬
校對 吳淑芳
封面設計 蔡婕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058-2 (精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神・鬼・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

/焦大衛著，丁仁傑譯，初版，臺北市：聯經，2012年
10月（民國101年），384面，14.8×21公分（臺灣研究叢刊）

譯自：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folk religion of a
Taiwanese village

ISBN 978-957-08-4058-2（精裝）

1.民間信仰 2.臺灣

272.097

101018029



1968年作者焦大衛(David K. Jordan)攝於台南縣西港鄉保安村。



台灣人觀看作者在廟中拿香拜拜的情景（出自《台灣畫刊》，農村版，1967年6月10日）。

中文譯本序言

這本小書，是我在芝加哥大學做研究生時，於1966-1968年間進行田野工作後的一個成品。書中所描寫的地點，是位於台南縣的一個村落。遵循美國人類學家的傳統，我用了一個化名「保安」來稱呼這個村落。如同在本書第一版的謝辭裡所表達的，我對極為慷慨的村民們始終心存感激，這些村民和我分享他們的人生，對我解釋他們的觀點，在我了解的增進中，感覺每一天和村民的相處好像又都是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以當時的標準來說，本書初版的價格是昂貴的，所以購買者不多。當初版售罄，出版商詢問了一些在美國的教授，他們是否願意用這本書當作整個課程的主要教科書，當然，結果可以想見，答案是否定的。在一間美國大學裡，有誰會願意用一整個課程來講授保安村的宗教？！於是出版商把這本書的版權還給了我，而這本書也就跟著絕版了。

在此同時，有幾個價格低廉的盜版版本，在台灣卻賣得很好，我於是和敦煌書局簽了約，而出版了這本書的「第二版」，二版做了幾處校訂，不過基本上它跟一版還是一樣的版本。這個二版在市場上出現了好幾年，但是它現在也絕版了（後來有第三版的出現，新的版本

裡，將羅馬拼音系統轉換成了國際標準化的漢語拼音系統，我將它放在我所任教大學的網站上，提供給大眾使用）。

這本書在台灣曾印行的版本，不管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它比起美國的初版，都更大地影響了更多的人。而多年來，有各種專業的中國研究專家們曾告訴我，當他們過境台灣時所購買的和所閱讀過的這本書，在他們決定要將自己的生涯專注於中國研究或是台灣研究時，它曾發揮過很大的作用。

當我在保安村進行田野工作時，大陸正處於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動盪中；而在台灣戒嚴體制下的政府，仍然抱持著反攻大陸的希望，它對任何有台灣文化特色的事情都持著非常戒慎的態度，這兩種政治情況，都讓美國學者或是會將台灣當作是「真實中國」的一個代替品，或是有意忽視它其實並「不是真的中國」。而我當時是將台灣當作是一個南中國文明的真實而充分的展現，並且是一個多族群「大明」華人文化中的一部分，它有著一部分是獨特，一部分又是與其他地區有著共享模式的生活方式，我的這種看法，非常令人訝異的，竟然是與當時其他人的觀點非常不同。而在我的這個立足點上，同樣的，我的不把台灣文化放在戰後族群衝突，或經濟發展模式，或日本占領的影響，或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等框架（所有這些都是在當時美國很流行，但卻是更易使人產生迷惑的輕忽性的觀點）中來處理，在當時也是與別人非常不同。當時流行的觀點，也許是有趣的主題，不過我當時不認為這些流行的觀點，對於了解台灣人的生活方式而言是有幫助的。

那時，我對普通話的操控能力並不好，而對於閩南語基本上是全然不行，即使我是亟需運用到這兩種語言來與人進行溝通（我一直認為閩南語就像普通話一樣是一個中文系統，唯一的差別是它未被指定為官方語言）。為了彌補我的缺陷，我持續地練習語言，經常使用錄音帶

錄音，並依靠研究助理的長期幫助，書架上則擺滿了普通話和閩南語的辭典。我所能盡力做的，是盡可能去重複檢查文字、拼音、定義，和其他語言上的細節。幸好，我先前曾受過語言學方面的訓練（很可惜，我的普通話至今仍然很糟，而我閩南語的知識，到今天仍然不足以達到流利操作的狀態）。

不過，文化不只是完全關於語言。當我住在保安時，當時有幾位耳聾的村民，他們使用著不是很具有系統性的手語動作。我觀察他們，發現他們雖然比我的語言能力還要差，但是比起我來，他們在掌控「台灣人屬性」上，卻比我能夠做到的好得太多。就像我在保安村所學習到的許多事情一樣，這一點是我至今都還在深切思考的可茲學習的課題（就我所知，關於台灣鄉下聾人的世界，目前還有待人們去進行進一步的民族誌考察）。

除了對於那些我寫錯的部分以外——雖然我不知道我寫錯的是哪些部分，但無疑的書中一定會出現不少這類錯誤——我認為這本書中所描述到的那些保安村民，應該會認為我書中寫到的許多事情其實都是平淡無趣的，因為這本書只是記錄了村民已經熟知的習俗和間斷性發生的事件而已，況且書中的鋪陳，許多又和存在於村民習俗知識裡問問題的形式間有著很大不同。

對於今日的保安村民來說，這本書早就過時了：書中有著關於村民祖父輩們漸漸消逝中的世界的某種模糊性的、黑白照片般的簡要的印象。更糟的是，當書中專注於宗教實踐的層面時，主要的內容包括了——鬼、附身、驅魔、改運等等這一類事情——這本書並沒有呈現人們生活中比較愉悅性的部分。我所描繪的宗教信仰與實踐，它們會吸引我的注意，有一部分是因為它們和英語世界讀者所知的有所不同，不過更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內容，正是這些人們用來對抗困境的

文化資源，我希望我在書中已經呈現出來了：這些資源是多麼的有效和富有適應力(或者說至少它曾經是如此)。

我個人平凡的努力，能引起丁仁傑這樣已在人類學研究方面完成不少作品的優秀學者的興趣，並且這些材料能被他用以作為他自己對當代台灣宗教研究的歷史性觀點的依據，這讓我很感惶恐。對我這本舊書完整的中文翻譯，可能會使我這本書獲得了超出它應得的注意力，我非常感謝丁博士。台灣人的生活方式充滿著宗教意味，我很高興我這本小書曾有助於英語世界裡的幾個世代認知到了這一點。我希望丁博士中文翻譯版的讀者們，在讀完這本書後，也能夠分享我的想法，也就是在台灣，傳統宗教非常有效地服務了這個地區的人們，而當這些宗教信仰與實踐幫助了台灣人安居於此，這一套文化世界看起來是如此的迷人。

David Jordan(焦大衛)

La Jolla, California

英文版第一版序言

1966年秋天到1968年夏天，我在台灣西南部一個講閩南語¹的村落做田野，並以這段時間所收集的資料寫成了本書。在本書開頭，我最好先描述我在台灣的情況，以及研究期間碰到的一些特殊問題。我爲了這個研究所需的語言，在史丹佛大學上了兩期的暑期密集漢語課程。這些準備並不夠，兩個學期的暑期漢語訓練（一共約五個月），尚不足以讓身帶著書面資料，而在講閩南語的人群中進行研究的人，產生有效率的工作。所以我在田野的時間（大約有三分之一到一半），都直接或間接耗在語言上，爲了避免語言上的誤解，我甚至過分地小心和仔細。除了田野中最後的一兩個月以外，我的訪談只能是用普通話，或者是在有著「閩南語—普通話」間翻譯的情況下來進行²。

-
- 1 在地台灣人說閩南語。1945年以後強迫推行普通話，因此三十歲以下的人大都能說普通話。不談其他，就此而言，這表示我們可以用普通話做田野。不過，這也表示，當許多報導人會用普通話來交談，這會混亂了人類學家對於閩南語區域的研究。如果用閩南語來做田野，當然會得到更好的成果。我認爲，前面所述，對於大部分雙語性的田野工作而言，都會是個重要的問題。
 - 2 訪談是由一位助理用閩南語進行的，但並沒有及時翻譯，而是事後再由助理根據他的筆記或記憶來謄寫成文字，或是先錄音，然後再聽寫出來。訪談中我所能了解的程度，大致上還能夠跟得上訪談的進行，並能夠做到都沒有遺漏主要重點。這種做法，後來證明，比起訪談中很不自

我在村裡的情況非常好，一開始就贏得了村裡一位夙有聲望的長者，和他那教育程度良好，且能說普通話的兒子的信任與熱心幫助。他兒子把我的研究當作他自己的事情，爲我介紹村裡以及周圍地區的許多朋友。這裡的人對於我對台灣文化感興趣這件事從一開始就感到高興，他們還很納悶爲什麼美國人不早點來，直到現在才來研究這一個精采的村落。我也引起了地方警察和小鎮官員的興趣，在他們熱心地協助下，我很容易取得普查和其他資料。幾乎所有當地人都歡迎我的到來，對我的研究感興趣，並且盡力合作，這些情況，讓台灣成爲進行研究的一個愉快的地點。

在村裡的頭三個月左右，我的時間大都花在鑽研台語教科書上。這些教科書當然無法避免使用羅馬拼音，而台灣人都不懂羅馬拼音。結果就是，我很難找到任何老師來教我念這些教科書，我開始覺得這種方式並不正確。不過，即使現在要重來一次我可能也不會再採用這種方式了，但這樣做也還是有幾項好處。其中的一個好處就是，這使我看起來「沒有惡意」（有些村民一開始還懷疑我到這裡來的動機）³；另一個優點是，我沉迷於這些教材，強烈顯示出我和我所宣稱的一樣，是一個學者，而學者在中國是很受尊敬的；第三點，這意味著對於一大群操普通話的年輕訪客來說，我是一個「專家」，而透過他們，我很快地就學到了很多事情，多到或許其中還有很多是我所未能確實理解的。

在這前三個月的後期，我由附近村子請來一位研究助理，透過他

（續）——

然地同步或一段一段的翻譯方式，來得更好。當然，除了在我寫日誌的時候以外，英文是不會被用到的。

- 3 就我所知，台灣人對我所抱持的唯一懷疑是，認爲在背地裡，我可能是一個要來此地吸收信徒的基督教傳道人。

我開始進行普查和訪談。到了仲夏，我又雇用了另一個男生，和另一個女孩來擔任臨時助理，幫我訪談關於女性角色和小孩教養方面的問題。整個1967年夏天，我們四個人就像是在進行一個永無止境的台灣文化討論課，各自忙碌著自己的工作。直到1968年七月底我離開台灣之前，我都還一直雇用著其中兩位男士。

我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宗教，爲了收集資料，我們騎著摩托車在台南市和台南縣穿梭超過一萬哩路。我希望盡可能收集更多數量和種類的資料。但在來台灣以前，我並沒想要做宗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沒有先設定明確的假設。收集和了解宗教方面的資料，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很困難的，我不確信我的資料和預先建構的任何假設間不能合適地兜在一起。沒有條理加上目標分散，結果是我記錄了很多事情，但許多都還很粗淺，僅在少數主題上材料收集得密集一些。

讀者很快就會發現，在資料不足的地方，我的推論反而很大膽。我自己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嘗試直接承認而不隱瞞，因爲我認爲人類學家對這些事最好是坦白和明確一些，而且是比應有的甚至還要更多的坦白和明確還比較好。

本書試圖呈現並探索我在台灣收集的資料，以及回國後對這些資料的思考中所呈現出來的某種規律性。這是第一次有人嘗試將隱藏在各種台灣人宗教活動裡的某些邏輯原則加以系統性地呈現。兩位很有能力而且對我助益極大的研究助理：陳昭彥和李茂祥，協助我在台灣的研究。此外還有黃秀孟（現在是王宮田的夫人），在1967年的夏天曾協助我訪談村裡的婦女，並收集村裡的諺語和其他資料。對這些忠實的工作夥伴，我要表達我對他們的衷心感謝。

當我在台灣時，曾經得到許多幫助和激發，這包括台灣大學的陳奇祿教授，以及中研院民族所教授凌純聲、李亦園、劉枝萬、王崧興

以及Madame Inez de Beauclair。其他一些在台南的朋友，經常給我各種建議、鼓勵和協助，他們是陳少庭、Peyton Craighill牧師及其夫人、William L. Parish博士及其夫人、Kristofer Schipper博士及其夫人等，我非常感謝這些好朋友的幫忙。

本書大部分的資料，曾出現在本人博士論文中(1969年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有些人曾協助我準備博士論文，指點我整理我的所見所思，我特別要感謝我在台灣做研究時期的指導教授Melford E. Spiro，我也要感謝Nur Yalman教授，他慷慨貢獻出他的時間，在我回美後，還辛苦幫助我將田野筆記轉化成精采論證。Victor Turner教授和Kenneth Starr博士，在芝加哥曾與我詳盡討論我的資料，兩位教授的批評讓我受益良多。這四位教授我都深表感謝。有些地方我接受他們的建議，改進我的作品；有些地方即使我未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但他們的意見仍激發了我很多想法，並讓我重新思考許多問題。

Spiro教授和Thomas W. Johnson博士曾經閱讀我早期的草稿，從和他們的討論中，我受益良多。

另外要感謝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Raymond Ford先生，在出版過程中，協助改進本書的可讀性。感謝劉耀紀先生，他為這本書書寫相關的漢字。也感謝John W. Haeger博士，他為本書的封面題寫毛筆字。

我最要感謝的是我所研究的村落保安村的人們。他們接納我，並提供我他們的時間、知識、信任和對我研究的興趣，我才有可能探索這些常常看起來模糊而又奇特的現象。本書描寫的是保安村的生活，書裡最動人有趣的部分都是保安村人慷慨向我展現的。我真的要這麼說：追根究柢來說，這本書是他們寫出來的作品，而比較不是我的。我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在裡面扮演了一個角色。

我不可能一一指名感謝村裡的人。簡短的導讀不可能放得下這麼

長的一個名單。如果我一定得指出村裡對我最有幫助的朋友，也是在台灣鄉間提供我生活協助並不斷教育我的人，無疑地就是我那慷慨的房東郭朝性和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兒子郭登超，在台灣時他們對我的幫助我無時不可或缺，這些是我所最感激的。

這個研究以及我在研究所的訓練，是由美國國家衛生院的研究計畫5-F1-MH-24, 2571-R04-MH-13526-01所支持。有一部分小額的獎助來自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的學術代表會議，補助了本書的照片和圖表的準備工作，我非常感謝這些公共機關的幫助。

英文版第二版序言

本書嘗試全面檢視南台灣保安村農民的民間宗教。本書並不是要報告這一個村莊裡的宗教儀式及宗教風俗，更不是要描述當地的節慶和神明事蹟，而是要探索保安村集體宗教生活背後的運作邏輯，和以能夠提出一個可以說明部分對於整體之意義的模型為研究目標。

本書第一版於1972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但是因定價一直都略高而銷售不易，最後它絕版了。而在台灣，拜好幾種廉價盜版之賜，本書一直都有不少讀者。有時，這些讀者會寫信給我表達謝意，他們告訴我：這本書雖然簡短，但以一種容易理解的方式，概述了傳統中國宗教的許多內容。這些讀者的熱情，以及台灣盜版銷售狀況的持續成功，催生了現在這個合法的台灣英文版，就此我要表達我對台北敦煌書局的感謝¹。

目前這個英文版和初版的差異是，它改正了一些問題不大，但令我難堪的錯誤(我希望我能說那是手民之誤)。因此現在這個版本，可說是一個校正過的新的重印版，而還不算是一個修訂版。在我來說，這是一個審慎的決定。我上次閱讀本書，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重讀本

1 爲了讓本書同樣普及於美國大學的課程，本書同時有新的美國版本，出版社是Kinko's Publishing Group of Santa Barbara。

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所說描繪的事件背後所帶有一種活力，而不只是那些對於台灣1960年代所發生事件的描繪而已。如果我今天要來寫保安村，當然會和當時寫的有些不同，例如說，很顯然的，我將必須去反映台灣農村多樣豐富的景觀，和它愈來愈少的農村風貌(1960年代我住在保安村時，隔壁鄰居兒子很多，生產工具卻不足，居住在地板骯髒的簡陋土角厝裡。如今他們的家是磚房，地板上鋪了磁磚，還有一個兒子穿梭在台灣與墨西哥之間販賣人造珍珠。而在本書裡所出現的保安村，它仍是一個較為單純的地方)。如果要我今天來寫這本書，我會將1969年之後許多新出版的地方宗教和民俗資料，尤其是中文的，盡量在寫作中反映出來。如果要我今天來寫這本書，我可能會詳盡的寫(或是反覆去說明)一些我在當時並沒有能好好發展的論點。我的文字也會較為平實而不那麼注重文字上的琢磨。不過不管怎樣，重讀本書後，我仍確信，在間隔的這段時間中，我所又看到的事物和閱讀到的材料，都不會讓我對當時所寫想要改變多少。本書所提出的模型，我覺得到目前為止依然能夠成立。

然而我還得加上一個說明來讓事情的全景更為清楚一些。我們應該要記住這重要的一點，本書討論的是鄉村民間宗教(village folk religion)，就好像民俗或民間藝術一樣，它必然是村民所未清楚自我意識到其存在的一個系統。對社會科學家來說，民間信仰當然是宗教裡最主要的一部分。但在中國的「宗教性」(religiosity)裡，還是有著某些在保安村裡所看不到的重要面向。例如，在本書之後，我和Daniel L. Overmyer合著的《飛鸞》(*The Flying Phoenix*)一書裡，我就討論了教派會社(sectarian societies)在台灣及晚清帝國時代中所扮演的角色。教派主義(sectarianism)和鄉村宗教不同的地方在於，它的成員是以個別信仰者而不是以社會團體為單位，而信徒是有自覺地信奉教

義，並關心個人的宗教功德，這已成為重要的宗教層面之一。教派主義回應宗教需求的方式，和我在保安村所看到的那種鄉村宗教中的宗教形式，大部分是不一樣的。同樣的，本書中也討論到了僧侶和其他宗教專業人士，但書中所描寫的只是那些被村民找來以提供儀式的例子，並不能代表所有的宗教專業人士。在人文學科的宗教研究裡，了解專業宗教人士對於宗教的想法，一直是這個研究傳統裡的核心部分，研究中國的宗教思想這件事應該也是如此，但是在這一方面，本書對此完全沒有著墨。另外，本書中只提到了一點點的是「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將廟和廟宇中心整合在一起，而在其複雜交互關係中將地方歷史予以神話化」的這一類大型區域系統（這些系統是我在1980年代中期的研究主題）【譯按：例如保安村附近的「西港刈香」這一類大型廟會活動】。最後，就祖先崇拜(the cult of ancestors)而言，比起其他地區，保安村在這一方面顯得比較不那麼重視，所以在台灣其他地方所看到的祖先崇拜，會比我在保安村所看到的祖先崇拜的情況複雜得多。一個有著祖先崇拜傾向的村落，是否在各方面會和保安村有類似性？如果一個地方放了更大的注意力在祖先崇拜上，那麼保安村的這種民間宗教模型，會有多大的幅度被替代？這些問題的答案目前仍不是很明朗。